

中国文化产业研究 2019 年度学术报告

周建新,胡鹏林

(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广东 深圳 518060)

摘要:2019年中国文化产业学术研究总体呈现出成果数量略减、质量提升、焦点集中、热点凸显的态势。在学术热点方面,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文化产业立法、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人工智能、场景理论、游戏及电竞产业发展等议题得到了颇多关注,反映了学界对于文化政策调整、科技进步以及产业实践探索的快速响应;在常规研究领域方面,关于文化产业的基础理论、产业业态、企业园区、产业政策的研究相对集中,并在跨学科研究中形成较为成熟的研究规范,形成了一批稳定的学术机构和研究队伍,这为文化产业的学科建设沉淀了基础性力量;在文化产业会议和期刊方面,品牌化趋势明显,影响力日渐增强,内容和形式越来越丰富,逐步构建起了文化产业交流的新途径,有利于形成良性循环的学术社群。未来,我们认为需要继续增设文化产业本科及研究生专业,加强文化产业基础理论研究,关注文化产业传统和前沿的业态,强化文化产业的公共文化服务功能,加强文化产业学术界、业界和政府的交流与合作。

关键词:文化产业;学术报告;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人工智能;文旅融合;文化产业政策;文化产业业态;地域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园区

中图分类号:G 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20)01-0057-12

一、2019 年文化产业研究概况

2019年中国文化产业研究整体呈现出研究成果数量稳中有降、质量大幅提升、学术反应速度加快、研究队伍年轻化、成果学术影响力和社会价值增强等趋势。相比较前一年,文化产业研究专著数量出现大幅缩减,论文数量略有下降,重点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有较大提升。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共出版文化产业专著120部,在中国知网上发表以“文化产业”为主题词的论文2332篇,其中CSSCI来源期刊发表304篇。

综观2019年文化产业学术研究概况,其出现

如下特色和变化:(1)文化产业学术泡沫程度降低,学术边界和学术方向逐渐清晰;文化产业研究队伍数量大增,且呈现年轻化趋势。(2)学术研究反应速度加快,各种科技热点、经济热点、政策热点迅速反馈到文化产业研究领域,形成具有一定学术影响力和社会价值的学术成果。学者们虽然关注新业态,但是对新科技、新业态缺乏深度研究,文化产业研究缺乏科技人才的参与,呈现“文化强科技弱”的格局。(3)传统文化产业领域纷纷寻找新机遇,通过跨界融合、跨学科研究理论和方法创新等方式推动传统文化产业研究的创新发展。(4)文化产业研究专著数量有下降趋势,宏观的文化产业年度报告、行

收稿日期:2019-11-20

基金项目:广东省基础研究重大项目“广东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问题与对策”(2017WZDXM034)

作者简介:周建新,法学博士,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化产业、区域文化研究;胡鹏林,文学博士,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文化产业研究。

业研究成果较多。这虽然有利于把握文化产业全局,为学界、业界和政府提供参考,但是缺乏对业态、现象、空间地域等问题的深入挖掘,没有形成从鲜活文化产业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新理论和新方法。(5)文化产业会议出现品牌化现象,受到学界、业界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一些学术会议和论坛通过创新主题、形式等手段,吸引了政、产、学、研等各界人士参与,因此文化产业的学术影响力得到增强,社会知名度不断提高。学术期刊尤其是重点核心期刊越来越关注文化产业,出现了相对固定的栏目和作者,培育了文化产业的学术社群,繁荣了文化产业学术景象。

二、学术热点透视

文化产业研究具有较强的时效性,2019年文化产业研究的热点领域主要集中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文化产业立法、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人工智能、场景理论、游戏及电竞产业等领域。

(一)多层次范围内的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的重大主题,2019年以此为主题的论文发表达26篇,主要围绕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思路、策略、路径和政策等问题展开论述。如金元浦认为需要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及其市场体系;范周等提出深度融合、守正创新;贺达等比较了直接干预型、中央政府间接引导型、地方政府间接引导型等3种产业政策干预方式,认为间接引导是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最佳政策。这些研究主要针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存在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不充分、文化产业结构发展不均衡和文化产业要素市场不完善等问题,提出各种解决思路和路径。此外,还有学者探讨了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江西、吉林、贵州等省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和策略。总体而言,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文化市场体系、文化科技融合、文旅融合等方面,研究者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和文化产品供给策略、现代产业指标体系等,对我国文化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二)国内外视野下的文化产业立法讨论

我国文化产业立法于2015年正式启动,2019年《文化产业促进法(草案)》出炉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部法律的出台引起了文化产业界的广泛关注。如周刚志等提出文化产业促进法可以成为文化产业的基本法,坚持“能细则细,宜粗则粗”的原则形成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框架和法制框架,再通过配套的法规、规章来具体落实文化产业促进法的实施措施和机制等其他内容^[1]。还有学者比较了法国、韩国等国的文化产业法律,供中国文化产业立法借鉴。随着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电影促进法、文化产业促进法等文化领域法律的制定,我国文化产业从口号式发展、粗放式发展过渡到规范化、法制化发展。

(三)宽领域体系下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及文化产业规划建设

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城市群和区域开发的最新战略。自2019年2月18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以来,各方力量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研究迅速深化。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研究论文有近20篇,主要集中在大湾区的文化金融、市场体系、协同合作等问题上。其中王林生认为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具有人才创意化、生产动态化、产品智能化、消费定制化、资本多元化等表征,粤港澳大湾区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的机制创新需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强化大数据资源在现代化水平、协同发展、需求导向和科技支撑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要在区域发展、政企关系、产业发展、行业配置等领域做好协调统筹^[2]。金元浦、意娜等学者分别从创意经济、经济体系、广州深圳产业基础、香港创意资源等角度切入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产业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具有较大的启发性,提出了很好的路径和策略,但尚未给出具体的实施路径和落地方案,或缺乏可操作性,未来需要在此角度强化研究。

(四)多学科角度切入下的文化产业跨界研究

2019 年对创客运动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研究仍有论及,但数量较前些年减少。从人工智能和场景理论两个角度切入文化产业研究,是伴随着实践和理论发展而生的文化产业学术热点。人工智能是近年来的科技热点和经济热点,对诸多产业产生重要影响,其对文化产业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2019 年关于人工智能对文化产业的影响的研究论文有 12 篇,涉及文化产品供应链、管理机制革新、风险防范、价值传播等主题。如杨毅等人的文章分析了人工智能赋能文化产业融合创新的技术实践和优化路径。宣晓宴分析了人工智能时代文化生产所面临的新形势和新问题,以及人工智能时代文化管理机制面临的新挑战,提出了智能化时代文化建设的使命^[3]。

从场景理论切入文化产业研究方面,虽然 2019 年的成果数量不多,但是质量较高、影响较大,对于文化场所、文化产业园和企业发展具有较大指导意义,其研究问题涉及城市发展、城市更新过程中的文化场景营造、亚文化场景建构、利用场景培育文化产业园的社群参与。如徐雅琴以场景理论为视角,具体分析探讨了某地城市更新的文化策略转向。张铮等学者具体提出可以利用场景理论的 5 个元素作为文化产业园的转型出发点,可建构、营销、运营以及传播场景,增强文化产业园的生产性与消费性^[4]。对于这种把外在于文化产业的热点引入到文化产业研究的做法,是值得鼓励和推广的,跨界、跨学科的研究有利于丰富文化产业研究的内涵和外延。

(五) 强现实关联引领下的文化产业实践研究

此类研究既关照到了文化产业的文化属性,也关照到了现实发展的科技诉求。在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需求背景下,提升设计文化水平成为了文化产业转型的一大路径;区块链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主要集中讨论区块链技术在著作权保护、管理和交易中扮演的角色。而游戏和电竞产业研究,因为受到年轻人追捧和社会舆论争议,逐渐成为了文化产业研究热点。2019 年涉及游戏产业研究的论文有 130 余篇,主要集中在政府监管、版权、游戏与影视融合发展等主题。如刘效廷等从技术、产业等方

面讨论了电影和电子游戏融合的趋势^[5]。电竞产业市场虽然呈现爆发式增长,但是相关研究较少,论文仅有 20 余篇,主要集中在电竞平台、产业融合发展等主题。如郑英隆等利用双边市场理论,分析了电竞平台的成本和定价问题。

在新兴的电竞产业领域,仍有较多问题亟待厘清,以方便人们更好地把握电竞产业,这其中就涉及到电竞与直播、俱乐部、影视等相关产业链关系的研究。另外,游戏及电竞的版权归属、内容分级以及监督管理等问题也需要学界、业界和政府共同努力形成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促使游戏和电竞产业走向规范化和法制化。

(六) 人工智能、5G 研究异军突出

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当今时代,关于人工智能与文化产业的关系,受到学者们的特别关注。解学芳针对智能化创新遭遇的人文伦理挑战、文化创意困局与 AI 入侵边界等问题进行反思,以明确 AI 创新的文化科技伦理边界^[6]。5G 带来了划时代的“万物互联”,也为文化产业带来新的研究课题。在 5G 的加持下,从内容生产、传播到消费,整个文化产业链都将呈现出深度融合的趋势,5G 带来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新模式。吴承忠认为 5G 技术影响下,文化产业将在产业技术、文化产品、商业模式、产业管理等方面表现出新的发展趋向,并将促使文化产业体量迅速增加和文化产业布局区域差异拉大^[7]。

三、文化产业基础理论研究

我国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然而现有的理论体系已经滞后于实际发展,构建新时代文化产业基础理论体系则显得尤为重要。文化产业基础理论研究是近年来文化产业研究的短板,但可喜的是仍有一批学者深耕基础理论领域,贡献优秀研究成果。2019 年文化产业基础理论研究主要在文化产业理论体系建构、文化产业的集聚和集群理论、文化产业观念的发生及历史演变和文化产业商业模式与产业路径等方面展开。学者们主要从基础理论、发展史论、应用理论和未来发展四个层面构建具有中国特

色的文化产业基础理论体系。例如,在基础理论方面通过对文化产业本质的再研究,有学者提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制度,以此平衡文化和科技的发展,探索文化产业的新发展方向。此外,把握时代发展脉络是文化产业基础理论体系构建的另一重要出发点。有学者认为,从我国时代发展特征与我国文化产业变革的角度出发,立足文化产业各门类的具体课题与典型案例,分析目前文化产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才能更好地对未来趋势做出研判。

(一)文化产业集聚和集群研究理论更为丰富

2019年文化产业集聚和集群理论研究可以分为中国文化产业集聚、集群理论研究和地区文化产业集聚、集群理论研究两部分。关于文化产业集群理论研究在不断地丰富,产生了一大批成果。何金廖等学者引入国外城市研究中的“城市舒适性”理论,讨论城市舒适性对创意产业集聚的作用机理^[9]。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运用约翰·霍兰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对研究文化产业聚集和集群具有指导意义。通过运用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可以研究文化产业集群演化机制的形成、过程的变化、动力的来源、结构的构成、模式的选择和评价的科学性等问题,揭示文化产业集群的演化过程及其基本特征,从而进一步论述这些集聚特征对相关因素所产生的影响。

对地区文化产业聚集和集群进行研究有助于推动该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如马立平等通过对京津冀地区文化产业集聚水平及特征的研究,提出了京津冀地区文化产业集聚需要突出文化特色、提高整体集聚程度、做好区域布局、加强文化产业联合等四点建议^[9]。晏雄通过全球文化遗产与丽江文化产业集聚的研究,认为全球化对于促进地方文化资源产业化与集群化发展具有重要助推作用,而文化产业集群所拥有的自我调节机制也可以修复全球化与地方化之间的冲突,促进文化产业集群的良性发展^[10]。这种将全球化视野与地方发展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对地区文化产业集聚研究具有创新性启示。

(二)文化产业历时性发展研究成果进一步夯实

文化产业观念的发生及历史演变作为发展史论,是文化产业理论研究中的重要一环,2019年度对该理论的研究相对较少。“文化产业观念”如今已获得国家层面的认可并纳入了国家话语体系,我们需要对此进行进一步阐释以帮助我们把握来龙去脉。文化产业发生学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文化产业观念的发生与变迁、文化产业发生的动力机制、文化产业的历史与规律、文化产业发生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等。以李凤亮和宗祖盼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产业发生观念认为在当下引入发生学方法是丰富文化产业理论体系的一种有益尝试,具有理论建构意义、方法论更新意义、学科建设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11]。

我们认为将发生学的观念植入文化产业基础理论是一种可行的方式,为文化产业基础理论的研究开拓了新道路。在文化产业历史演变研究方面,李向民和杨昆梳理了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文化产业发展脉络,探究了不同时期的文化与产业政策、文化市场的经营主体、文化市场及消费、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律,通过历史与现实发展的结合,为推动文化产业的升级和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提供了可行性建议^[12]。

(三)文化产业商业模式和产业路径研究贴近现实

文化产业商业模式和产业路径是近几年来受到关注较多的问题,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两个问题展开研究和探索。2019年文化产业商业模式的研究多立足于文化产业市场繁荣和数字经济发展的背景。以陈少峰为代表的文化产业商业模式研究主张把握文化产业经济变化和时代发展方向,坚持未来导向作用,并以前瞻性的理念揭示文化产业商业模式的本质规律^[13]。学者们对于“互联网+”时代下文化产业服务模式的探讨打破了行业间的壁垒,促进了文化产业商业新模式的形成,这种商业模式能够实现“1+1>2”的多倍协同效用。

关于文化产业产业路径研究,学者们主要集中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方法论上,认为我国必须走文化特色与集群化道路、数字化与网络化、智能化道路,建构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创新管

理体制,并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下开拓文化产业创新之路,成功实现我国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提高文化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如有学者论述了“互联网+”时代我国电视剧版权交易市场的新发展;也有研究成果涉及到资本、粉丝等因素对文化产业生产的影响,如分析粉丝、舆论、流量、资本等要素对电视剧生产逻辑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也有学者研究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试图开展平衡文化产业经济影响和社会影响的讨论。另外,一些基于我国供给侧改革、文化规划、文化空间重塑、文化集群创新、文化企业创新模式问题的研究,涉及范围较广,容易出现分析浮于表面、难以深入问题根本的情况,建议将相关的研究集中到具体的点再开展研究工作。

四、文化产业业态研究

2019年中国文化产业业态研究的学术成果主要体现在业态融合、艺术产业和数字创意产业研究等方面。其中,业态融合研究包括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文化和科技融合、文化产业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研究三方面;艺术产业研究包括影视产业和演艺产业(包含音乐产业)两方面。

(一)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颇受瞩目

文化和旅游融合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新趋势之一,也是近年来学者们重点关注的热点问题。关于文旅融合的研究集中在文旅融合的根本逻辑、文旅融合路径、文旅融合模式创新等方面。理清文旅融合的根本逻辑是开展文旅融合的必要前提,文旅融合并不是简单地将二者拼凑在一起,而是将职能、理念、产业、资源以及技术等要素深层次地融合起来,在推进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处理好共性与个性、产业与事业、政府与市场、居民与游客等关系,并从体制、法规、产业统计、资金支持、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等方面提供支持等。如宋瑞等学者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体系角度对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现状与未来加以测度与展望^[14];胡钰等分析了文化旅游产业PPP项目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路径^[15]。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活化”保护也受到文

化产业学术界的关注。

探索文旅融合路径是促进文旅融合的必经之路。不断拓展文化创意产品市场,重点培育特色文化旅游项目并打造精品IP,在国家文化旅游体制机制改革的引导下将文化体验、文艺表演、诗意和情结作为促进文旅融合的重要驱动力,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从路径上进一步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创新文旅融合模式是推动文旅融合与产业升级的必然要求。必须大力创新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创新文化和旅游管理体制和政策模式,相关单位应该积极树立融合理念,推动技术融合,强化资源和区域融合,实施跨界融合,通过提质增效做到高质量协同发展。

(二)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实证分析加强

文化与科技融合是近年来国家倡导的大趋势,推动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是文化产业界关注的重点。2019年关于文化和科技的融合研究集中在影响二者融合发展的因素与如何推进融合两方面。廖青虎等通过对天津市具体城市文化产业和科技融合的政策效力进行测量研究,得出激励型政策、强制型政策对促进文化产业与科技融合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的结论^[16]。在文化与科技融合路径方面,学者们认为需优化文化资源配置,建立健全文化大数据体系及文化科技创新体系,加强优化我国文化产业的生產要素和科技创新要素的影响效应,从法律法规、政策规章制度、产业结构和创新等方面入手,实现文化科技协同发展。然而我们认为以上相关路径的研究过于侧重宏观,缺乏微观层面的研究,希望今后能够有更多文化科技融合微观层面的研究以具体化的形式展现出来。

(三)文化产业和传统产业融合发展探讨领域进一步扩大

在我国产业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传统产业与文化及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是近年来各地政府和学界都在关注的重大问题。学界普遍认为,传统制造业仅仅提供物质产品,但是“文化+制造业”的融合发展却能提供物质产品和文化服务,既夯实传统制造业的基础地位,又能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2019年出版了10余部“文化创意+传统产业”

的专著,集中研究了文化创意与电力工业、服饰业、动漫游戏、会展业、农业等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并结合具体案例提出了融合发展的创新路径和新机制,拓展了文化产业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四) 艺术产业研究异军突起

我们将2019年艺术产业研究分为影视产业和演艺产业两部分。影视产业研究兼具历史性和当下性。影视产业划分为电影产业以及网络剧产业。在电影产业方面,尹鸿以编年体的方式完整记录中国电影产业全面改革历程,深入地阐述市场与话语权的关系、文化产业改革与发展的关系,为文化产业和文化软实力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启示,对电影产业的发展有重要的指导和参考作用,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和行业影响^[7]。另外,2019年《流浪地球》等类型电影取得极大的票房成功,学者们对科幻电影及艺术电影等进行了研究,如围绕艺术电影与文化产业之间存在的矛盾,思考艺术电影产业化的可行性;还有学者对科幻电影在科学性、幻想性、民族性上进行理论阐释,试图找到科幻电影的合理定位等。

网络剧及网络综艺产业化发展研究亟待加强。网络剧和网络综艺作为新兴影视产业业态,在近年尤其受到关注。张智华研究了近年来我国网络自制剧的发展情况,着重分析了网络剧产业与“粉丝”经济等的关系,并探讨了网络文艺的性质和特点及其发生、发展的规律,认为网络文艺发展方向是当下网络剧研究需要重点讨论的方向。同时,针对网络剧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不断增强精品意识,注重做好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加强网络环境监管,才能有效地促进网络剧产业发展。然而,我国目前在网络剧产业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如何管理网络剧并促进产业化发展,也是我们今后应该重点关注问题之一。

由于音乐与表演总是相互融合、同时出现的特殊关系,我们将二者归为表演产业。表演产业研究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感。对演艺产业的研究集中在梳理中国音乐产业发展史以及发展路径两方面。通过梳理音乐产业史并结合音乐产业发展现状能够发现当下存在的问题,结合中国演艺产业的实践

经验发展音乐产业,要整合音乐教育资源并培养优秀音乐人才,加大对视频音乐作品版权的保护,发掘和传承民族音乐文化资源,这些措施涵盖了艺术公共管理、表演艺术管理、音乐产业运营等方面的内容。也有学者关注韩国等国外地区的音乐产业发展状况。

除了关于艺术产业的研究外,2019年还有一些研究成果涉及到艺术资源的积累、管理和交易,也可归为艺术产业研究这一类。如王秀伟研究了西方博物馆艺术授权的模式和价值链,并总结了其对我国博物馆艺术授权发展的启示。

(五) 多理论视角审视数字创意产业发展

数字创意产业也是我国近年来关注的热点,2019年的研究成果更是呈现爆发式增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发布了《中国数字文化产业发展趋势研究报告》,首次全面展示了我国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状况和成果。花建和田野以上海市数字创意产业中的数字游戏产业为例,指出上海促进数字游戏上市企业发展的有效举措在于:结合城市和产业的双转型,优化游戏产业的空间布局;推动游戏产业的对外开放与合作,建设中国游戏产业的国际辐射中心;打造优良的游戏产业生态,发展多个游戏产业的发展引擎等方面^[8]。在对文化创意产业影响因素研究的方面,有学者利用钻石模型,得出数字文化产业开放度对中国数字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影响最大的结论。也有学者从另外的角度出发,通过考察数字文化生产者的劳动境遇,探究外部劳动语境的特征及其对个体劳动境遇的影响,指出人们应对数字文化生产者给予更多的人文关照。还有学者系统论述分析游戏组模爱好者和数字游戏产业的关系,探索创意产业中“工作”与“休闲”的新边界,并提炼这一现象背后意识形态的变迁过程。综上所述,数字创意产业的研究不同于从路径或模式方面探讨的其他业态研究,而是基于不同学科视角,站在更广阔的角度研究相关问题,具有更多的人文关怀,这是值得未来业态研究借鉴的地方。

值得关注的是,在互联网时代,服务全球化的趋势加强,我国互联网企业“出海”渐成常态,如抖

音国际版 Tik Tok 在国外多个国家颇为流行。2019 年有学者撰文分析互联网行业文化出海现象。我们预计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将会有一批学者围绕着互联网企业文化内容产品或服务、中国文化软实力、文化接受、文化市场管理及文化政策等内容展开分析。

五、文化产业政策研究

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政策整体展现出主体多元化、主体网络化、结构层级化以及政策数量渐进增加的演化态势,政策动态复杂化趋势明显。2019 年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国内文化产业专项资金政策及补贴、文化产业政策运行与监管、文化体制改革等问题。

(一)文化产业专项资金和补贴研究取得新成果

关于文化产业财税政策研究中的国内文化产业专项资金和补贴的问题,值得学者们进行深入反思。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自设立以来的确成功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发展,然而我们必须直面这种带有“半计划”选择性产业政策手段与文化市场间产生的矛盾,并努力寻求解决方案。政府盲目扶持显然已经落后时代发展潮流,理清专项资金在当代文化产业发展阶段的具体目标与时间限度,对优化市场资源配置与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有着巨大好处。臧志彭运用计量经济研究方法从政府补助对文化产业经营绩效、研发投入、增加就业和无形资产等的促进效应方面进行了绩效评估,探索中国文化产业政府补助创新模式及优化路径,并创造性地提出中国文化产业价值链模型,为文化产业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同时,将文化产业创新发展与版权制度和政府资助相结合,也是研究的创新点,研究充分地辨析版权制度和政府资助两项政策工具的价值目标和功能缺陷,指出应结合市场特征和产业现状选择合适的机制,理顺政府资助引导与版权市场运作,以此建立起文化产业创新驱动模式等。

(二)全方位探讨文化产业政策运行与监管问题

文化产业政策运行与监管涉及产业运行机制、

产业监管制度以及税收优惠对文化资本配置的影响等,研究项目较多且成果显著。例如吴磊基于协同创新视域,研究文化创意产业与协同创新的关系、文化创意产业协同创新的要素、文化创意产业协同创新的运行机制、文化创意产业协同创新的发展现状、国外文化创意产业协同创新的经验借鉴,从而提出文化创意产业协同创新的实现路径等^[19]。关于文化产业监管制度的研究集中在互联网文化产业监管,重点突出我国互联网文化产业监管制度的现状和问题,从创新管理、创新技术手段和监管标准等方面入手提出相应改革措施。在税收优惠对文化资本配置影响的研究方面,刘慧凤着眼于文化企业并购,她以 2011~2016 年文化企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从企业的产权性质、区域环境影响、多元化程度和税收优惠政策的激励效果开展研究,提出从国家政策视角,继续实施并优化文化企业税收优惠促进政策,以促进民营类文化企业创业和发展。同时建议国家采取针对性措施,鼓励文化企业跨地区并购,另外根据东西部地区不同发展状况采取不同的针对性税收措施等^[20]。

六、文化企业和园区研究

2019 年度文化企业和园区研究主要表现为以下特点:

(一)文化企业研究稳中求变

文化企业是联系政府和市场的重要纽带,如何发挥政府的作用实现文化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丰收”是学者们的重点研究问题。政府应逐步优化政策,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寻求外部资源,为文化企业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适当减少对文化市场的干预程度,合理引导文化企业成功实现转型升级。如何实现文化企业自身的良好发展和转型升级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企业自身必须积极响应政府层面的号召,尤其是国有企业必须实施资源整合、跨界融合、资本结合的三大工程。

姜帅和贝政新具体以出版企业为例,基于绩效管理、利益相关者以及公众满意度等理论,遵循价值取向、目标导向、科学性、系统性、战略性及可操

作性原则,并依照各类主客观数据,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出版企业绩效评价的理论模型,确立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提出“在推进出版企业绩效评价体系优化与完善的过程中,应坚决抵制并打破‘四唯’倾向,积极引导出版企业有效平衡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推动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健康发展”的号召^[4]。

我们认为,关于文化企业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延伸至更加微观的层面,如从文化企业自身的改革角度出发,发掘文化企业改革的内在规律,检验规律普遍性并加以利用,从而推动我国文化企业的改革发展;同时加强互联网文化企业的研究,探究在新的技术背景下文化企业发展的思路,帮助我国数字创意产业发展提质增效。

(二)文化产业园区研究视角不断扩展

我国文化产业园区从总体看,发展势头猛,数量增加快。但我国文化产业园区发展的历史较短,还处于发展初期,尚在摸索阶段,目前对文化产业园区发展的规律认识还不够,尤其在发展对策与转型升级路径以及园区风险管理方面,值得更加深入的研究。从目前来看,文化创意社群集聚滞后是文化创意产业园区需要解决的基本难题之一,有学者借助场景理论框架,梳理出能够激发提高社群参与的场景维度,并在优化提升方面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建议。

关于文化产业园区风险管理,有学者在采用文化产业研究常规方法的基础上,从计算机学科的相关理论中寻找研究方法,在实践中通过一系列的风险评价模型,可以获得代表文化产业园区整体风险水平的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结果,从而对文化产业园区的规划和发展做出科学的风险评估。面对快速发展的文化产业园区,我们需要在传统的研究路径和方法上积极创新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并从多个学科角度和层面结合最新的成果来促进文化产业园区向更好的方向转型升级和发展。

七、地域文化产业研究

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地域文化产业研究共

有论文101篇、专著31部(含公开出版的研究报告或蓝皮书),成果广泛分布在区域性文化产业研究报告(或蓝皮书)、地方性文化产业发展研究、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以及国家战略性区域文化产业研究如“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经济发展带、藏羌彝文化走廊、长江文化产业带研究等方面。

(一)地方性文化产业研究立足当地现实,成果鲜活

各省市地方性文化产业研究基于地方文化产业发展现状,提出地方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探讨相关的解决方法和地方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学者们在进行相关问题的研究过程中是基于不同的学科视角,体现出文化产业研究交叉学科的特点。如有学者在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地方文化产业逻辑的过程中提出了稀缺性和通约性的重要性。其指出稀缺性是地方文化参与文化创意产业的价值增长点 and 核心竞争力;而通约性则是文化产品生产、流通与消费的“通行证”,地方需要通过打造稀缺性的文化内容来形成产业竞争的特色与优势。另外亦有学者结合产业经济学和政策学的研究方法,发现出城市建设文化都市中存在的短板问题并探讨解决方案与转型路径。

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研究成果丰富,研究主要通过理论结合案例的方式,介绍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现状,体现出了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与地方特色,为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理论构建和具体实施路径指明了方向。学者们关注热点集中在少数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以及民族特色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建设方面。如李技文等以贵州省黔东南州为例,分析了苗侗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以及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的路径^[22]。

(二)城市群与文化产业发展研究成果丰富

我国地域文化产业研究的另一重大方向是“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首都经济圈、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区域文化产业研究。学者们在进行国家战略性区域文化产业研究的过程中,

重视整体性布局发展观念,突出战略性地区研究成果。学者对整体性布局发展研究的重视体现在关注我国文化产业的地区间梯度转移、提倡建立文化产业生态圈以及主张优化我国文化产业区域布局政策等方面。根据我国文化产业的地区梯度转移现状,我国目前地区文化产业转移不可再完全照搬现有的产业转移理论,必须构建相应的新的理论体系,因此中西部地区需要在积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同时,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以推动区域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积极探索具有区域特色的文化产业发展道路,实现我国区域文化产业均衡发展。

(三)“藏羌彝文化走廊”文化产业研究深化

2019年关于战略性地区的文化产业研究除了集中在上述的京津冀等空间集群问题方面,“藏羌彝文化走廊”相关研究也有新成果。早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了“藏羌彝文化走廊”这个民族学概念,旨在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作学理佐证。2019年6月1日,“新时代藏羌彝走廊发展论坛”在四川成都顺利召开,将藏羌彝文化走廊地区文化产业研究推向新的高度。李炎指出国家在培育藏羌彝文化走廊文化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国家诉求与地方利益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和产业发展的矛盾,所以应该发现存在于国家和地方文化产业发展之间的市场基础、产业要素配置等的内在矛盾,理性认识带状发展的基础条件和客观制约因素,才能有效促进区域文化产业发展^[23]。可以看出,顺应国家战略发展的要求,国家战略性区域文化产业研究将会长时间延续下去,越来越多的成果将呈现在我们面前。

八、文化产业年度报告

2019年文化产业年度报告数量呈现稳中有降的态势,但报告中的产业问题聚焦度高,总体质量有所提升。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共发表各类文化产业年度报告50余部,主要以全国性文化产业业态报告、区域文化发展报告、区域文化产业业态发展报告等为主。

(一)全国性文化产业业态及相关报告多聚焦产业发展热点

此类报告以国内某种文化产业业态、文化产业现象为主题,由国内知名高校及领军学者组织,形成年度研究报告。此类报告多为每年一部的连续性研究报告,有既定的体系和相对稳定作者群,编纂愈加成熟,主题内容多元,对每年的文化产业业态和现象有较为深入研究,对学界、业界和政府均有较强参考意义。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中国文化产业年度发展报告》《文化科技创新发展报告》《中国文化品牌发展报告》《中国文化企业报告》《中国文旅产业发展报告》《中国数字创意产业发展报告》《中国虚拟现实产业发展报告》《中国文化传媒投资发展报告》《中国非遗及其产业发展年度研究报告》《中国电视剧产业调查报告》等。

(二)区域文化发展报告多展现区域建设成果

此类报告往往是由地方省市组织编写,一般着眼于大文化领域,单设文化产业发展篇章,此外还涉及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事业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人才队伍等内容,这些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外围要素。2019年较具代表性的区域文化发展报告有《山东文化发展报告》《陕西文化发展报告》《河南文化发展报告》《海峡两岸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报告》《深圳文化发展报告》《广州文化发展报告》等。

(三)区域文化产业业态发展报告多集中政产学研力量编撰

此类报告近些年来大量出现,多是重视文化产业发展的地方政府委托高校或研究机构组织编撰。2019年出炉的区域文化产业业态发展报告有《四川文化产业发展报告》《河北文化产业发展报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业发展报告》《北京文化产业与出版传媒研究报告》《上海文化产业发展报告》《广州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报告》《杭州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报告》《杭州市互联网文化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武汉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报告》《成都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报告》等。这些报告的数量逐年增加,体现了地区政府和研究机构对区域文化产业的重视,而且

从研究报告的内容来看,基本覆盖了传统文化产业业态、地方性文化产业特色、各级文化产业政策等研究主题,这种数量增加、覆盖面增大、研究细化的趋势还在强化,地区文化产业研究机构成为文化产业研究领域重要的新力量。

九、文化产业学术会议与期刊

(一)文化产业学术会议品牌化,可持续性趋势加强

2019年,北京大学文化产业新年论坛、清华大学文创论坛、深圳大学文化科技创新论坛、海峡两岸文化创意产业高校研究联盟白马湖论坛、南京艺术学院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年会、华中师范大学文化科技创新与文化产业高峰论坛等成功举办,形成了较大影响力。2019年文化产业学术会议具有以下特征:

1.品牌化。文化产业学术会议已经初步形成了品牌化,每年各地学者都会前往参会,或者通过网络新闻、参会论文等各种途径了解品牌学术会议最新动向。学术会议与科研机构形成了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格局,沉淀了一批品牌科研机构,比如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南京艺术学院文化产业学院、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等。与此同时,一批相当稳定的学者队伍出现,推动了文化产业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

2.连续性。文化产业学术会议开展较早,且连续多年举办。比如中国传媒大学“海峡两岸文化创意产业高校研究联盟论坛”已在大陆和台湾两地共举行了十八届;北京大学“文化产业新年论坛”已经连续举办十五届且成为文化产业界开年盛会;深圳大学“文化科技创新论坛”已连续举办八届,一直贯彻“国际化、高层次”的理念;华中师范大学“文化科技创新与文化产业高峰论坛”已连续举办七届,这种连续性会议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2018年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举办的文化科技创新论坛首次引入了“企业家论坛”板块,引起热烈反响。2019年的文化科技创新论坛延续了此种做法,推出“跨界论坛”,收效良好。

3.创新性。学术期刊也重视学术会议的举办,文化产业学术会议举办主体增多,形成了一种新的会议形态。如2019年9月在山东大学举办了第一届“新时代文化创新论坛”,此次会议由《山东大学学报》《福建论坛》《深圳大学学报》等三家期刊联合举办,魏建、管宁、董世峰等组织者是多年来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学者和主编。这次会议不仅探讨了新时代文化产业发展的各类主题,还首次形成作者宣讲与学者、主编审议的面对面碰撞,以一种新形式推动了文化产业学术繁荣。

(二)重点期刊文化产业刊文量提升

2019年一般学术期刊对文化产业的关注度没有明显变化,但是重点期刊的文化产业刊文量有明显提升,其中CSSCI期刊刊发量比2018年提升了30%。《深圳大学学报》《山东大学学报》《福建论坛》等CSSCI来源期刊持续设有文化产业专栏,定期刊发文化产业类论文。这些期刊发表的论文质量高,经常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全文转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民论坛》《出版广角》《学术前沿》等期刊加大了文化产业刊文量。2019年,《人民论坛》有20余篇与文化产业相关的论文,《出版广角》有13篇与文化产业直接相关的论文。重点期刊文化产业刊发量的提升,既反映文化产业研究水平的提高,也体现出文化产业学术和学科的影响力正在逐渐增强,从传统人文社科领域转向文化产业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文化产业青年学者数量也快速增加,逐渐呈现出文化产业、学术和社会影响力综合提升的学术生态体系。

十、总结

在对2019年中国文化产业研究进行综合分析和评述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在以下方面需要进一步提升。

(一)继续增设文化产业本科和研究生专业

从各类研究报告和学科研究中可以看出,文化产业是社会亟需的学科门类,但是目前学科发展相

对滞后,文化产业本科专业及学生数相对较少,无法满足快速增长的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需求,尤其是文化产业学科分类、一级学科硕士点、博士点的学科归属都存在争议。如何理顺文化产业的学科属性和归属,多增设文化产业本科和研究生专业,成为未来文化产业学科发展和学术繁荣的重要基础。

(二)加强文化产业理论研究

从2019年文化产业研究专著和论文统计数据来看,文化产业基础理论研究占比偏低,对于中国文化产业史、学术史以及理论建构的研究较为薄弱,未来需要在文化自信的背景下重点加强中国文化产业理论体系的建构,重点研究文化体制改革以来的文化产业发展史、近20年文化产业学术史。从近百年、近70年、近40年的文化产业发展史中探索建构中国文化产业理论体系。从实践中总结理论、从理论出发来关注实践,是加强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的重要路径。

(三)增强文化产业的公共文化服务功能研究

我国顶层设计已经提出建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and 现代文化产业体系,这是给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提出更为明确的界定和目标,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也与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问题紧密相关。目前已有学者关注到此类主题,但因我国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学术界对此应该保持旁观者和审视者立场,始终把握文化及相关产业是为人服务的基本原则,并清醒地把这一原则贯穿在文化产业研究之中。

(四)深耕文化产业业态传统和前沿

2019年文化产业业态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动漫影视、创意设计、出版传媒等领域,对于最传统或最前沿的业态关注相对较少。对传统文化产业业态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传统特色手工艺等虽有研究,但数量较少,缺乏长期而深入的关注,其处在最容易被学术界遗忘的角落。对前沿的文化产业业态比如人工智能、无人机、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文化产业的应用业态需文化产业学者与科技工作者共同探讨,但是目前各说各话,尚

未形成真正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更难以通过前沿学术成果引领文化产业的发展,研究滞后于实践。未来需要加强这两者的研究,既保留我们的根本,同时也高度关注高新技术产业,真正发挥科学研究的价值。

(五)加强文化产业学术界、业界和政府的交流与合作

中国文化产业水平还不高,在此发展阶段,亟需学术界、业界和政府共商共计。业界是主导者,应贡献文化产业实践平台和产业经验;政府是推动者,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服务和政策支持;学术界是引领者,为文化产业指明发展方向和路径,这是三方应有的交流与合作格局。但是目前文化产业学术界与业界、政府之间依然有较大区隔。未来学界应该创新思路,从理论、实践、政策等多层面切入研究,让研究活起来,从而引导政府决策,引领产业发展。

参考文献:

- [1] 周刚志,姚锋.论中国文化产业立法模式——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引导[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3(2):133-141.
- [2] 王林生.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与方向[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36(4):61-70.
- [3] 宣晓晏.人工智能时代文化生产与管理机制革新[J].艺术百家,2019,35(1):70-75+124.
- [4] 张铮,于伯坤.场景理论下我国文化产业园的发展路径探析[J].出版发行研究,2019,(8):33-37+27.
- [5] 刘效廷,黄望莉.数字媒介下“电影+电子游戏”的产业互动现象分析[J].当代电影,2019,(7):161-164.
- [6] 解学芳.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化创意产业智能化创新:范式与边界[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42-51.
- [7] 吴承忠.5G智能时代的文化产业创新[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4):51-60.
- [8] 何金廖,曾刚.城市舒适性驱动下的创意产业集聚动力机制——以南京品牌设计产业为例[J].经济地理,2019,(3):134-142+161.
- [9] 马立平,鲍鑫,熊璞刚.京津冀地区文化产业集聚水平及特征分析[J].出版发行研究,2019,(3):29-33.

- [10] 晏雄.全球化与地方化:世界文化遗产与丽江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2):34-38.
- [11] 宗祖盼,李凤亮.论中国文化产业观念的发生[J].学术研究,2019,(1):162-168.
- [12] 李向民,杨昆.新中国文化产业70年史纲[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10):59-72.
- [13] 陈少峰.未来导向的文化产业商业模式创新[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17(2):38-41+97.
- [14] 宋瑞,冯珺.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基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体系的测度与展望[J].财经智库,2019,(3):82-94.
- [15] 胡钰,王一凡.文化旅游产业中PPP模式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8,(9):160-172.
- [16] 廖青虎,孙钰,陈通.城市文化产业与科技融合的政策效力测量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19,(5):22-27.
- [17] 尹鸿.通变之途: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产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5.
- [18] 花建,田野.数字游戏产业上市企业的发展驱动力——以上海为重点的研究[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35(2):37-47.
- [19] 吴磊,周婧景.协同创新视域下我国文化创意产业运行机制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7.
- [20] 刘慧凤.税收优惠对文化资本配置的影响——基于文化企业并购视角的研究[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44-57.
- [21] 姜帅,贝政新.新时期出版企业绩效评价体系构建研究——基于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构视角[J].科技与出版,2019,(4):57-61.
- [22] 李技文,李桂明.苗侗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现状与路径探析——以贵州省黔东南州为例[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8,(4):143-152.
- [23] 李炎.国家、地方诉求与产业发展规律: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的学理思考[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1):57-67.

【责任编辑:周琍】

2019 Annual Academic Report on China's Cultural Industry

ZHOU Jian-xin, HU Peng-lin

(Institute of Cultural Industry,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518060)

Abstract: In 2019, the academic research on China's cultural industry showed slight decrease in quantity, improvement in quality, narrow focuses and highlighted hot issues. In terms of academic hot issue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legislation of cultural industry, cultural industry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cene theory, game and e-sports industry development have received a lot of attention, reflecting the rapid response of the academic circle to cultural policy adjustment,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industrial practice. In conventional research field, more focus has been put on the basis theory of cultural industry, industrial formats, enterprise parks, and researches on industrial policies, and a mature research specification has been formed i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a number of stable academic institutions and research teams have come into being, which lays a foundation for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in cultural industry. In terms of conferences and periodicals on cultural industry, they are marked with obvious branding trend, ever increasing influence and ever richer contents and forms, and gradually build up a new way of cultural industry communication and is conducive to forming a virtuous circle of academic community. In the future, we believe that we need to continue to increase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programs in cultural industry, put more efforts in basic theoretical research, pay attention to the traditional and frontier forms in cultural industry, improve its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function, and enhance the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academia and enterprises in cultural industry.

Key words: cultural industry; academic reports;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digital creative industr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the policy of cultural industry; cultural industry trend; regional cultural industry; cultural industry quarter